

# 《尚书·酒诰》译文

程水金

《酒诰》是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封康叔于殷都旧地妹乡对卫国君臣颁布禁酒令的诰辞。诰文充分体现了周公宽以治民、严以治吏以及怀柔殷遗、尊重民俗的治理智慧，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上古政学经典。

由于历来注家将原文“妹土嗣尔”一句，或因袭伪孔安国《尚书传》读成“妹土嗣尔股肱”，解为“妹土之民，当竭其股肱之力，相承不绝以为此纯一之德，播种黍稷”（宋人林之奇《尚书全解》）；或读为“妹土嗣尔股肱之力”，解为“妹土之民承汝教道之功，皆能继续股肱左右，训迪之美而为纯一之行”（宋人夏复《尚书详解》）。而朱熹门人蔡沈《书传》则解为：“妹土民，当夙夜四股之力，无有怠惰，大修农功，服劳田亩。”至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又解为：“妹土之人，世为尔股肱，当专务种其黍稷。”今人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则连上文读为“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解为“妹土臣民承汝康叔成为股肱之力”，且译其文曰：“洮邑地方的人们呵！你们应当练习手足的勤劳，专力在种植黍稷上。”刘氏秉承厥师顾颉刚之教，于《尚书》一语钻味有年，用功颇勤，代表了近世以来《尚书》研究的最新成果，犹如此次裂生解；其析文破句姑且无论，亦于“妹乡之民可以继续饮酒”即只造言不替民的经文主旨全然未达。至于诸家大同小异因循神来之说，皆与本诰禁酒之义为无瓜葛，则又不胜枚举矣。可见古今注家，于此处经文，既不得其读，亦不得其解，致使周公尊重妹乡殷民风俗习惯，官民有别，以及官吏之中又严于周人而宽于殷遗的政治策略，历千载而湮没不彰，殊为憾事。若其他小小误读亦尚多有，因无关宏旨，也就无庸赘及了。是以本人近著《尚书释读》，对于此等前人滥说，一皆不取，以期正本清源。

由于《尚书》原文诂屈聱牙，一般读者难以卒读，兹据拙著《尚书释读》，将本篇释译成现代汉语，以续读者，且就正于方家。

王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小子肇国在西土，朕语兹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大小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王语考小子有正有事，无弃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大小德，小子惟一。

妹土嗣尔，股肱朕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率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考惟君，尔乃饮食醉德。丕惟曰尔克我观者，作侑于法。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棗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为第一节，周公以文王受命元年所颁之禁酒令转告康叔，令其于妹邦施行禁酒。禁酒范围仅在妹邦各级官吏，平时不得饮酒，只许其宗族内部长老行燕私之礼及祭祀先祖旅酬之时方可畅饮，当然也须注意饮酒之德，不可失礼。但对殷遗平民不作禁酒要求。

周公以摄政的身份对康叔这样说：将这个重要的命令在妹邦明确地颁布下去吧！你尊敬的先父周文王接受天命在西部开国建邦之时，他就严肃地告诫各地各级官员以及朝中各部正副官员及其执事人员说：寻常之时无缘无故就不要喝这个酒了！上天庇佑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周邦的开国元年。我们要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回报上天对我们的福祉。再说，老干爷如果要

我们施加惩罚，那一定是我们发生了混乱丧德的恶劣行为，而这些丧德败行，没有哪一样不与风行饮酒有关。而且那些大大小小的邦国发生丧邦亡国的惨痛之祸，也没有哪一次不是饮酒所造成的罪孽。文王告诫各地各级官员以及朝中各位大臣与他们的子弟，平时不许无故饮酒，只在祭祀之后可饮，但也要端庄稳重，不可醉酒失态。文王还说，我们的民众要教育子孙后代，不要把土地出产的粮食轻易浪费了。这样教育子孙，就会激励他们热爱劳动，同情农夫，心地就会变得善良；教育他们善于听取长辈们深邃的人生见解及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且要求他们把重大品行操守与日常生活小节兼顾统一起来，不要以为酒德有失无关大局，酗酒乱性照样有失人品。

妹邦的股民可以继续饮酒，不在禁酒之列；妹邦之民，以其手足股肱之力专心勤劳于耕耘稼穡，在家上下奔走，忙忙碌碌，服侍他们的父母和兄长；或者竭其心智，不惜脚力，牵牛驾车，贤迂有无，外出经商行贾，以其所得之利孝养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与兄长庆祝子弟们的勤劳与持家，为他们的孝顺和富裕感到高兴并表示赞许，子弟们也会洗濯杯盘，自备一桌丰盛的家庭酒宴，给他们的父母兄长敬上一杯，子弟们也乐得开怀畅饮。这是妹邦质朴淳厚的民情风俗，不要因为禁止官员平时无故饮酒，就连民间的家庭酒宴也给禁止了。

妹邦的各级各类官员以及各地的长官属吏们，希望你们高度重视并认真听取我的教言；平时不允许随便饮酒，充其量只可在家长族老与宗子举行燕饗之礼，你们进献酒食之时才可开怀畅饮，吃饱喝足。但也要注意到：自始至终要观察酒局变化，掌控着酒量。酒局将散，已是醉眼朦胧之际就要立即道谢辞别，表示与宗室和长辈很亲密，已经喝得非常高兴了。否则，因为醉酒失了体统，便是对长辈和宗室不敬。因此，何时留饮，何时离去，都要合乎规矩，不可失了酒德。你们还可以在宗庙祭祀结束之后与宗族子弟及兄弟子侄们相酬酢之时，频频举杯，自享饮酒之乐。不过，无论是宗族长辈的燕饗之礼，还是宗庙祭祀之后众相酬酢，你们都要诚恳地顾及到自己是王朝的官员与职事，还要想到上天依顺善德，不可因酒醉而失礼，要自始至终维护王家官员的体面与尊严，时刻牢记你们是供职于王家的官员身份。

周公说：康叔封，我们地处西偏的周邦，往日那些内外官长与治事之臣以及他们的后裔子弟，庶几皆能执行文王禁酒的教令，平时设膳不多，也不饮酒，所以我们周邦到现在就能够接受股人的天命。

王曰：封，我闻惟口，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兹王畏相。惟御事厥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晋惟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于尹人祗辟。

我闻亦惟口，在兹后嗣王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淫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蠢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靡戢，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厥心疾。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为第二节，言殷代先王皆敬畏天命，励精图治；内外官僚官长，亦皆克尽职守，不敢偷闲自逸，更不敢沉湎于酒。至商纣王则酣饮无度，虐政残民，致使天怒人怨，终于自取灭亡。

周公以摄政的身份说：康叔封，我听说过去殷代的先圣王明君，由于上畏天宪大法，下畏黎民百姓，于是这些圣哲明王无不十分注重修身立德，个个拥有大智慧。自成汤之后所有的君王以至于帝乙，莫不励精图治以成就王业，也非常敬重贤能的辅相大臣。而所有的治事官僚无不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辅助他们的君王，从不偷闲懒散贪图安逸，就更不用说还胆敢聚众豪饮了。那些在京畿之外各地方服职的，无论是职位较高、治地较大的侯服或甸服，还是职位较低、治地较小的男服，甚至不能独立成治的附庸小国，所有的封疆大吏以及附庸小君；那些在朝廷中担任各级各类衙门的正副官长及其公职人员和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以及各个宗族的族长和居民点的负责人。大大小小的内外官员甚至基层领导，没有谁胆敢沉湎于饮酒。他们不仅不敢沉湎于饮酒，而且实在没有空闲沉湎于饮酒，只是一心一意地辅助君主成就王业，光大显扬君王的才德与政绩，以及用心专力于治理民众，让他们敬畏法度。

我还听说，最近的后继者商纣王与他的祖先们大不一样，他整天泡在酒缸里，在糟丘肉林中醉生梦死。他的大小政令一概出不了王宫，在民众中产生不了丝毫影响，广大臣民与他离心离德。他自己也只是得过且过，尽管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他也无心无力改变这种濒临崩溃的帝国危局，反而更加疯狂地寻求作乐，想方设法寻求感官刺激，甚至造酒池，悬肉林，让宫中男女老幼在肉林酒池之间裸身奔跑，相互追逐嬉戏。这种极端放纵、荒淫无耻的行为，简直叫人难以想象，全然不顾王家的尊严与体面。广大民众无不悲伤失望，痛哭流涕，一个辉煌的帝国，眼看就要被毁灭了。这个一心想着饮酒作乐、遍尝山珍海味的无耻君王，不仅不知道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反而更加荒淫无度。他的心也越来越凶狠残暴：把触怒他的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地烤成焦炭；因为九侯的女儿不愿意陪他纵欲，把她杀掉还不解恨，又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看不过眼与他争辩几句，就把鄂侯制成了人肉干；王子比干劝他不要这样残暴，他却把比干开膛破肚，说是要看看他这个圣人的心脏是不是长着七个窟窿！他如此作恶多端，还扬言自己有命在天，谁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死到临头了，他还硬撑着胖子说大话。他在商邑所造的罪孽实在太多，直到商邑覆亡之日，商纣王已经众叛亲离，成为名副其实的独夫民贼了。

祭祀是靠祭品丰洁与芳香才会赢得上天与神灵的欢心，而是凭着美德与善政，上天与神灵才会款享你的福礼。在商纣王治下，尽管祭祀频繁，祭品丰洁，可是上帝与神灵不是因为美德与善政而接受他的祭祀，敬享他的福礼；恰恰相反，上帝与神灵的所见所闻，却是贫穷无告的弱势群体怨声载道，社会黑暗，人间充满荒唐腐败之气，社鼠神狐，狼奔豕突，一派大厦将倾的颓靡之象，祭祀的芬芳与馨香，盖不过臭秽熏天与恶气干云。所以上天就毫不犹豫地给殷王朝降下了亡国之祸，对那个糜烂荒唐的商纣王也不加半点怜悯，因为他实在做得太过分。这并不是上天暴虐不仁，而是商纣王自己招来的罪孽。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语，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暨厥命，

我其可不大大监抚于时。予惟曰汝劫兹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胡惟尔事，服体服采；胡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胡汝刚制于酒。厥或诟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辜，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庸，乃事时同于杀。

王曰：封，汝典听朕兹，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此为最后一节，谓当以殷商灭亡为鉴，禁止各级各类官吏无事聚众饮酒。于殷遗进用之臣，则谨慎教导之，于周家大小众臣则强行禁止之。如有触犯禁令者，周家众臣先待教而杀之，殷遗进用之臣则暂且不杀，不教之导其改过，如有怙恶不悛者，则视同周人而格杀之。

周公以摄政的身份说：康叔封，我不善言辞，对你们说了许多话。总之，古人曾经说过：人不要仅仅只是用水来照见自己脸上的污垢，更应当以人事作为镜子来照见我们的政治得失。正是因为现在殷商王朝已经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天命，所以我们难道不应该把他们的灭亡作为镜子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吗？因此，我想说的是，关于戒酒，在政策上应当有所区别。你要谨慎地告诫从殷商时代过来的那些归服于我们周邦的朝中的众臣与各级各类主管冶炼和制造的技术官员们，他们都是殷朝归义于周邦的人才，当然都要谨慎地对待。还有我想说的是，对于你手下那些执事公务的周家众臣，无论是各级主管内部事务的官员，还是各类主管邦国政务的官员；还有对于你身边的那些位高权重如朋如友的股肱大臣，祈父是大司马，总管邦国的军政事务，负责缉拿抓捕违抗命令不服管制的叛逆之徒。农父是大司徒，总管邦国的教育事业，负责以五常之教训民众，亲睦九族，安分守己，以五土之艺培训民众提高生产技能，增加粮食产量，使邦国的百姓生活富足，人心向善，社会安宁。宏父是大司空，总管邦国的工程建设，负责制定方案，推进工程实施，监管工程质量，以及发明与探究各种制作及营造的技术与规律。总之而言之，无论官职大小，官位尊卑，他们肩负的责任都非常重大，因而更要强制性地勒令他们禁酒。如果有人告发他们，说：“有人在聚众饮酒。”你千万不要放过他们，尽管把他们一个个都抓起来，并且分头押送回丰镐京师好了，我将毫不客气地砍掉他们的脑袋，以儆效尤。不过，如果是从殷朝过来的那些进用于周邦的旧臣以及那些主管各种冶炼与制作的前朝技术官员，因为他们长期已在商纣王的时代养成了饮酒习惯，一旦旧病复发，沉湎于饮酒，可不能轻易处死他们，姑且对他们进行教育规劝，通过这种规劝与教育，让他们明白饮酒总事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沉湎于酒既败德又伤身，替他们指明人生的努力方向，帮助他们戒除不良嗜好，如果他们对于我们苦口婆心的告劝，诉之以情和晓之以理的心理引导置之罔闻，没有一点改邪归正的意识 and 行动，继续沉湎于饮酒之乐，我个人认为，这种人就是我毫不同情、断难饶恕的那种人了。对这种人的处理，就跟决聚众豪饮的周邦众臣一样，格杀勿论。

最后，周公以摄政的身份说：康叔封，你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听取我的告诫，不要让你的下属官员沉湎于饮酒。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

## 国学漫谈

### 慎终

《论语·学而》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慎终”意味晚辈、后生对逝者的敬重，“追远”意味人对自己生命和价值的敬重，“慎终追远”体现了“孝道”理念下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情结和生命敬畏意识。当把“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相对地看作为文化生命的延续的话，那么，贡献并缔造了中国文化优秀基因的传统

文化不应被遗忘于历史的故纸堆，而应走进历史的前台，转生为现代文化；同时，彰显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高扬与时俱进、和平合作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化自然要基于、源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已然构成“慎终追远”的文化生命传承关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深具“追根溯源”情怀。文化是有层级性的：单纯的地域文化、整体的民族共同体文化以及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文化。地域文化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民族文化是基于特定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而达至的群体文化，国家文化则是由多民族共同体所达至的通约性、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系统。无论是地域文化、抑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都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个体生命产生重要的影响，个体生命的历程中自然孕育着特定的文化基因；区域的、民族的、国家的人类共同文化又根据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要素，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个性”的文化基因。地域文化的演进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民族文化的演进、国家群体文化的演进同样在塑造属于群体的特定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之间潜藏着融通性，特定的文化基因自身正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文化的前后因袭形成了“源与流”、“根与木”的关系。诚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本土土壤中勃兴出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中那本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9页）由此可说，任何文化都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的文化演进形态。故，当人们构架和刻画现代文化时，自然要体思勘悟自己的历史文化，在“追根溯源”的历史情怀中考察个体生命和群体文化生命的智慧精神。“追根溯源”情怀既是塑造个体生命与价值的必然选择，又是塑造国家群体文化生命和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唯扎根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历史演进脉络的现代文化才能激荡勃兴，永葆文化生命生生不息的真精神。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涵韵“认祖归宗”意识。中华文明起源于大江大河，以农耕文化为个性，以和平、合作和天下大同为思想内涵，而其中的理念纽带就是“宗法伦理”。与之相关联，“认祖归宗”成为中国人生命存在和生产生活的自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文化演进和价值重构的首要法则。从狭义言，“认祖归宗”是宗法伦理社会下，基于血缘伦理而展现的个体生命价值选择和群体价值理念选择；但从广义言，它是基于中华文化传承而展现的“文化认同”，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民族和国家共同历史命运与文化精髓的集体记忆。寻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我”现在是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我是谁”“我曾经是谁”的主体之“我”天然、内在地存在着心理上和心灵上的自觉认同，倘若不能实现这种自觉的文化认同，必不能求达民族、国家文化基因的理性探索，走向“文化虚无”“历史虚无”，割裂“我曾经是谁”与“我”现在是谁”主体之“我”的主体性存在和在连续性、造成文化主体的“角色缺失”。就个体生命存在言，主体性缺失、角色缺失势必导致个体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流变为病态生命；就民族、国家文化发展言，文化主体性缺失、角色缺失则导致文化演进路上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大”，是脱离本民族、国家文化的演进脉络而走向自我民族文化的不愿认同和不敢认同。当然，造成文化“认同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本质错误在于未能体勘作为中华文化基本思想特质和思维方式的“认祖归宗”意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谓：“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同样，人不能两次犯同样的错误，曾经的“打倒孔家店”是“认祖归宗”意识的被动缺席。当今中国文化现代化、需理性张显“认祖归宗”意识，自觉感知和展开民族文化的“认同”，历史地考量自我地域、民族、国家文化演进历程中的优秀文化基因和思想精髓，为构架中华文化现代化探寻合理性的思想资源和合法性的思想铺垫。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秉持“子承父志”理念。“慎终追远”既是对人自然生命的敬重和敬重，还是对人精神生命的传承与承接，诚如《论语·学而》所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衡量“孝”道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当父亲在的时候，要观察儿子的志向；当父亲不在了，要观察儿子的行为，若儿子对父亲之合理原则不加以改变，可说做到了“孝”。“孝”不是对父辈精神的无限原则坚持和固守，而是对先人合理性价值和精神诉求的传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7页）。孝道原则应用于家庭伦理固然如此，应用于国家的文化建设同样如此。源于同一文明系统、同一文化血脉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当她为了适应不同的人文语境、社会语境乃至生产语境的需要进行文化要素的重组，自觉的文化认同自然推至为对自我历史文化优秀要素的吸收与借鉴。因此，文化的演进历程客观地遵循着“子承父志”的理念，唯有将作为民族与国家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和文化基因实现现代转生，才会创作出适合本民族个性、蕴含本民族自我主体性的“现代文化”。当然，此“志”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转生”意味着旧生命体的解体和新生生命体的诞生，“文化转生”是优秀传统文化生命精髓在现世中国实践历程中的进一步展开和自我优化。由“子承父志”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是“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态势、中国人民精神需求和世界发展格局而展开的中国文化模式的体系创新和话语创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所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这是“子承父志”理念在文化建设上的真切体现，是中国人不忘前贤远祖、勇于开拓创新理念的明白昭示！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 国学动态

# 传统道德当代价值

## ——“中国传统道德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中国传统道德高峰论坛”日前在武汉举行。围绕“中华传统道德”这一主旨，与会者从中国道德哲学、儒家德目和德行、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等角度展开深入讨论。

学者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关键概念进行了哲学新论。贡南南从生命节奏、时令节气、天地节律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节制”道德进行梳理，认为天道人性由之可以贯通思考。姚新中则从孟子“养”的概念入手，分析其生理之养、道德之养和养心之养的层次区别，由之可延伸出养生、精神、养性、养气等内容，从而对儒家伦理中内与外、德性与德行的互动模式进行哲学审视。

关于儒家是否具备公共道德属性，历来争议多多。针对儒家道德观念仅限于“熟人社会”、只重亲情伦理的说法，王国良予以反驳，认为自强不息、义以为上、反求诸己、立己达人、和而不同、身正信忠、选贤使能、以民为本等理念，都是古今中外共通的公共道德思想。郑淑媛认为，前诸子的道德价值建立在神的基础上，而先秦儒家则把道德价值的基础落实在个体的心理经验事实之上。

儒家伦理道德在两千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互为表里。冯天瑜认为，“五伦”先于“三纲”，前者成于封建时代，后者成于君主集权时代。将二者捆绑在一起，并不完

全符合中国思想史实际。吴光指出，阳明学的主要思想结构，包含良知本体论、致良知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和“亲民仁民”的民本论四个部分。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表现在道德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力行实践四个方面。张昭炜以方以智重启青原山王门讲会和《传心堂约述》一书为线索，勾勒江右王门心脉的传承情况。

张丽珠认为，戴震的人性论与孟子、荀子都有交集，戴氏认同孟子之性善论，其理论重心放在“如何实现善”上。他虽然与荀子同持气性论，但其性论结构则与荀子有本质不同，是更纯粹的理学诠释者。

论及中国传统道德，孝道是不可遗漏的焦点之一。欧阳楨人指出，《孝经》的根本哲

学理论基础来自孔曾思孟，其前提则是“性善论”，孝具有宗教性，是古代治国安邦的法宝。杨华指出，古代的养老礼、侍亲礼、家训族规、乡规民约，构成了古代对于孝行的礼制约束；在法律层面，从先秦到汉唐都有关于“不孝”罪的严格惩罚。中华传统孝道代相沿、传承不辍，不仅仅是儒家鼓吹和宣扬的结果，而是国家（法律）与社会（礼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姜生则着重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体制，指出孝道的古今差异。

本次论坛的议题，彰显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在讨论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格外强调中华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郭齐勇梳理了儒家人文教化的内核、目的、方法、功能和特点，认为历代通过礼教、诗教、乐教成就德性、培养君子、调节性情、美政民俗、知行合一，儒家的修身成德之教对于公民社会的公德建设，对于当今人们的心性涵养，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学者们指出，中国传统的“五伦”互动、君子内在修养、节制观念、孝敬之情、心性良知等思想资源，都可以转化为当代道德建设的文化助力，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许 颖）